

程远忠·林小毛·袁朝胜·杜波澄 编著

关贸总协定 与中国市场

机遇与挑战同时到来
影响广泛而深刻
关系到决策者·企业界·以至消费者
专家为你开阔视野解答问题



·海潮出版社·

关贸总协定与中国市场

程远忠 林小毛 袁朝胜

杜波澄 编著

海潮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127 号

书 名 关贸总协定与中国市场

编著者 程远忠 林小毛 袁朝胜 杜波澄

出版 海潮出版社(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编:100841)

印刷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17 千字

版 次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3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001—10000

ISBN 7-80054-407-9/F·11

定 价: 4.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导 论 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	(1)
第一章 历史性的抉择	(5)
一、GATT——中国的热门话题	(5)
二、找回失去的权利	(7)
三、必由之路.....	(11)
第二章 “经济联合国”巡礼	(17)
一、历史由来.....	(17)
二、组织与行政.....	(21)
三、GATT 机制	(26)
四、成功与挑战.....	(32)
第三章 多边贸易规则	(38)
一、无歧视待遇原则.....	(39)
二、关税减让原则.....	(49)
三、透明度原则.....	(53)
四、取消数量限制原则.....	(55)
五、保障条款.....	(60)

六、对发展中缔约方的特殊条款	(64)
第四章 多边贸易谈判	(69)
一、多边贸易谈判概述	(70)
二、肯尼迪回合	(77)
三、东京回合	(82)
四、成功与启示	(88)
第五章 乌拉圭回合	(98)
一、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概述	(99)
二、关税与非关税措施	(107)
三、纺织品贸易	(114)
四、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的新议题	(115)
五、条款的修改	(120)
六、关贸总协定体制运行	(122)
第六章 农产品贸易与中国	(125)
一、世界农产品贸易回顾	(125)
二、世界农产品贸易中的保护主义	(127)
三、农产品贸易与关贸总协定	(129)
四、美欧农产品补贴之争	(131)
五、对我国的影响	(141)
第七章 纺织品贸易与中国	(147)
一、多种纤维协定的历史演变	(147)
二、多种纤维协定的实质和影响	(152)

三、多边体制中的双边限制	(156)
四、对中国纺织业的影响	(161)
第八章 知识产权	(165)
一、何为知识产权	(166)
二、保护知识产权对企业的影响	(174)
三、中美知识产权谈判	(181)
四、影响与对策	(183)
第九章 倾销与反倾销对策	(187)
一、反倾销法的产生及演变	(187)
二、美国的反倾销法及其影响	(190)
三、对我国的影响	(195)
四、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201)
第十章 机遇与挑战	(205)
一、机电工业	(207)
二、化学工业	(212)
三、纺织工业	(217)
四、轻工业	(223)
五、建材工业	(228)
六、医药工业	(230)
第十一章 GATT 冲击波	(232)
一、开放的市场——低坝效应	(234)
二、体制的转换——价格与汇率	(240)

三、祸兮？福兮？	(244)
第十二章 关贸总协定与中国消费者	(248)
一、未来的角逐	(248)
二、最大的赢家	(253)
三、中国人真的能过上洋人的日子吗？	(256)
附件 I :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	(259)
第一部分 :概况	(259)
前言	(259)
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260)
二、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263)
三、中国参加的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组织 及有关的国际公约	(265)
第二部分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和体制	(268)
一、中国对外贸易政策	(268)
二、中国外贸体制改革	(271)
三、中国海关关税制度	(273)
四、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	(275)
五、中国进出口许可证制度	(276)
六、中国进出口商品的作价	(279)
七、中国外汇管理制度	(280)
八、中国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	(282)
第三部分 :组织机构和与外贸有关的出版资料	(283)
一、组织机构	(283)
二、与外贸有关的出版资料	(286)

第四部分:附件	(287)
附件Ⅰ:关于中国外贸制度的补充文件		(295)
一、《决定》和《纲要》的关系	(295)
二、《纲要》是在新的形势下为经济发展 和改革确立了中长期目标	(301)
三、关于近两三年中国外贸制度的变化情况	(305)
四、市场准入承诺	(312)

导 论

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

今年是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 500 周年。为纪念这次世纪性的伟大航行,欧洲各国组织了阵容庞大的帆船队,沿着这位伟大的探险家当年的航线,重温了 500 年前的探险梦,其场面之壮观,气氛之热烈,同近年来欧洲各国经济的不景气形成鲜明的对照。

事实上,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之前半个多世纪,中国的航海家郑和就已经率领他的庞大的船队成功地进行了 7 次远洋航行。不过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种时间上的先后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更重要的区别在于:郑和的海上远征所带回来的,只是“中华上国”的象征性的荣耀和各国朝贡的珍禽异兽;而哥伦布的航行所带回的,却是征服者带血的战利品,是黄金、白银、黑奴和以殖民主义为基础的欧洲近代文明。

直到 15 世纪末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轰动一时的巨著《大国的兴衰》一书里所论及的那样:15 世纪的亚洲还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中心,当时最有影响的几个亚洲强国,如明朝时期的中国、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印度,无论在技术、文化、军事还是社会组织方面,都要比欧洲先进得多,特别是中国,在当时已有 1 亿多人口,是欧洲人口的两倍多,城市规模

也比欧洲的城市大得多。15世纪初的明朝海军拥有1300多艘战舰，其中包括200多艘可用于远洋航行的船舶，拥有绝对的海上优势。“这个时候欧洲的居民们绝对看不出他们的大陆即将统治其余的大部分地球”。

哥伦布的航行之所以是世纪性的，不仅仅在于发现了新大陆，而在于它同时开辟了海上殖民贸易的新时代，并由此而引起了欧洲和勃兴，带来了持续500年之久的环大西洋文明。然而也正是在欧洲人开始海上贸易，并由此推动整个人类历史飞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封建王朝却实行了“片帆不许下海”的闭关政策，把整个世界拒之门外，使中华民族从此远离了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因此，当欧洲人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中华民族远远的落后了。闭关锁国的政策铸就了中华民族自近代以后的不幸命运，使这个曾经雄踞世界之巅的文明大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这段屈辱的历史所留下的巨大创痛和阴影，甚至影响到中国20世纪的历史选择和进程，使我们民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重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几百年来第一次真正面对世界的中国人，首先看到的是同外部世界巨大的差距。要找回失去的时间，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唯一的选择是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尽管道路并不平坦，但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越来越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前不久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了蓝图。中华民族正处于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的前夜。

仿佛某种历史的轮回。欧洲在拥有了近 500 年的辉煌历史之后，今天正在逐步走向衰落。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由环大西洋地区逐步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以至于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未来的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可证实此观点的，不仅有日本的经济奇迹和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南朝鲜、新加坡）的崛起，更有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紧跟其后，中国大陆自 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高速增长，更使这一地区显示出无穷的发展潜力，从而也似乎成了所谓“太平洋时代”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太平洋时代”的到来，对于恰好处于经济起飞前夜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次空前的历史性机遇。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由环大西洋地区向环太平洋地区的转移，必将加速国际资金和技术向这一地区的流动。并大大增加区内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从而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反过来，中国的发展也将为这一地区的繁荣作出贡献。新近在港、台和大陆华南地区形成的“新金三角地带”，已经以其惊人的经济成长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港、台资金和技术的大量涌入，华南地区不仅成为大陆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反过来，华南和整个大陆的经济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港、台的经济增长。这种完全基于经济发展的自身需要而自然形成的通过相互协作而达到共同的增长的模式，获得了来自东西方的高度评价，并大大鼓舞了世界特别是华人世界对这一地区的信心，以至于有人推论：21 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的深刻意义。这一重大抉择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和深

化,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必然归宿。这意味着中国将彻底打开自己的大门,进一步参与国际分工,完全按照国际惯例发展市场经济,最终实现同国际市场的接轨。这一重大举措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无疑将是全方位的,既是巨大的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在近期内,开放市场无疑会对国内工业产生相当的冲击,但从本质上说,这些冲击也并不一定就是消极的,它对于我们加速体制转换的进程,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特别是对于我国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从长远看,重返关贸总协定将有助于进一步加深中国同世界的联系,为中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敞开道路,从而也将为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的腾飞插上有力的翅膀。

第一章

历史性的抉择

一、GATT——中国的热门话题

对于中国人来说，1992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新年伊始，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便卷起一股巨大的热风，改革开放在经历了几年的低潮之后，再一次汇成汹涌的大潮，激荡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热血，信心、热情与从容的微笑再一次爬上普通中国人的眉梢……

由于南巡谈话的鼓舞，经济迅速升温，先是“股票热”、“房地产热”，现在又出现了“GATT热”。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的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关贸总协定”这个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曾经是陌生的字眼，突然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流行词汇。重返关贸总协定的影响与对策，成为社会各界所关心的问题，不仅为报纸、电视和各种会议所议论，甚至也成了寻常百姓的热门话题。

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同关贸总协定的关系中断了几十年，普通中国人对关贸总协定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但几乎所有的人都确信：重返关贸总协定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

件大事，将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人们的这种敏感，应该说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同时也是人们关注未来和对未来抱有信心的表现。

如果我们把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同前不久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联系起来，就更是不难理解为什么关贸总协定也会象股票一样成为普通中国人关心的热点。正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未来目标一样，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的努力和决心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的未来走向。这意味着中国将在更大程度上溶入世界，意味着中国全方位地参与世界进程和参与国际竞争，意味着中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的勇气和决心。这种勇气和决心一方面当然是基于对世界潮流和历史大势的认同，同时在更重要的意义上，也不能不说体现了中华民族从容地面对世界和走向世界的自信与气魄。

中华民族有着太多的骄傲，也有着太多的屈辱。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华民族几乎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恰恰是在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世界各民族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和不可或缺的最近几百年里，我们明显地落后了，并为此吃尽了苦头。我们太多的骄傲和太多的屈辱纠缠在一起，构成了我们难以外人道的民族情结，使我们民族在很长的时间里很难对世界抱开放的和从容的态度，而封闭的民族心态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妨碍我们走向世界脚步。

事实上，封闭并不是我们民族固有的个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或者说在中国处于世界文明前列的年代里，我们对于世界的态度是相当开放的。从汉、唐直至宋代，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是相当频繁的，特别是在中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

的唐、宋时期，首都长安、汴梁和商都广州都是真正国际化的城市。闭关锁国是走向没落的封建王朝的必然选择，同时又反过来加速着它的没落。所以，开放固然是强国之路，但它首先总是强大和自信的表现。

由此便不难理解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它首先意味着中华民族已经彻底走出封闭的心态，走出历史的阴影，以积极的、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走向未来。

关贸总协定之成为普通中国人的热门话题，应该说正是我们民族走出历史阴影的最好注释。

二、找回失去的权利

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 23 个原始缔约国之一。

1947 年 4 月 10 日，当时的南京政府应邀参加了日内瓦举行的国际贸易与就业会议第二届筹委会，并在会议期间与美、英、法以及荷兰、比利时等 18 个国家进行了关税减让谈判（即第一届多边贸易谈判），达成了关税减让协定，参加了拟定关贸总协定的工作。1948 年 4 月 21 日，中国政府签署了《临时适用议定书》，并于同年 5 月 21 日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成员。

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于 1950 年 3 月 6 日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照会联合国秘书长，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当时新中国受到西方各国的严重封锁，所处的国际环境异常险恶，关贸总协定当时又完全由美国人把持，中国无法参与关贸总协定的活动，因此与关贸总协定的关系中断了几十年。1965 年，台湾当局又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窃踞了“观察员”席位。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而为中国全面地重返国际舞台扫清了道路,关贸总协定按照联合国关于将国民党政府从所有国际组织中驱逐出去的决议,取消了台湾当局的“观察员”资格,中国政府开始恢复与关贸总协定的联系。

1980年8月,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执委会议,投票选举了该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即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阿瑟·邓克尔先生。

1981年,中国列席了关贸总协定纺织品委员会主持的第三个国际纺织品贸易协议(也称“多种纤维协定”)的谈判会议。

1982年11月,中国首次派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关贸总协定第38届缔约国大会,并与关贸总协定秘书处就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等法律问题交换了意见。

1984年1月18日,中国政府正式签署第三个国际纺织品贸易协议,并成为关贸总协定纺织品委员会的正式成员。

1986年3月,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先生应邀来华访问,并就香港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地位问题达成协议,即按关贸总协定关于原殖民地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规定程序,由中英两国政府联合发表声明,使香港成为关贸总协定的一个缔约方。同年4月23日,根据上述协议条款,香港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第91个缔约方。

随着与关贸总协定的联系和交往的增加,中国政府也日益认识到关贸总协定在协调世界贸易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日益认识到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86年3月,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先生访华期间,我国领导人已非

正式地表示了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的意愿。1986年7月11日,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钱嘉东大使照会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阿瑟·邓克尔,正式提出中国政府关于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

1986年9月,中国代表团列席了在乌拉圭举行的关贸总协定缔约国部长级会议,并成为这次会议所发动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全面参加方之一。

1987年2月13日,按照关贸总协定的有关加入程序,中国政府向关贸总协定正式递交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并通过关贸总协定秘书处向各缔约方提交了这一备忘录。同年,关贸总协定秘书处向我国提交了各缔约方对我外贸制度提出的书面问题329个。

1987年6月,关贸总协定“中国的缔约方地位工作组”正式成立,瑞士大使吉拉德担任主席。工作组的职责是:审议中国的外贸制度;起草关于中国恢复地位的议定书;提供进行关税减让谈判的场所。

1987年11月,中国向关贸总协定正式提交有关中国外贸制度的答疑文件。其后又先后4次在总协定中国工作组会议上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和关税制度等专题进行口头答疑,回答了各缔约国提出的问题近2000个。

但是,1989年以后,恢复中国缔约国地位的工作被推迟了,原因是由于中国于1988年底开始对经济实行“治理整顿”,这一暂时的经济调整使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疑问。中国政府于1989年11月向关贸总协定提交了《关于中国外贸制度的补充文件》,阐明了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但未能说服有关缔约方。加上政治因素的作用,美国、欧